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冬日懷馬臨

● 陳方正

10月底去薄扶林道聖士提反禮拜堂，參加馬校長的追思禮拜，為他扶靈的人先到會議室聚集。他的大女兒怡芳來了，負責接待的人要為我介紹，怡芳說：「不用吧，很熟的，都是老戰友了！」這寥寥三個字頓時勾起無數往事，和半個世紀的回憶。

初識馬臨，是我剛回中文大學教書的時候。那時聯合書院還在港島，規模很小，理學院只有數、理、化三系，主任分別是周紹棠、樂秀章和馬臨，他們都是從香港大學轉過來的，號「三劍客」。周少年白頭，談諧突滑；樂海派作風，不拘小節，馬卻謹言慎行，深思熟慮，和他們顯得很不一樣。理學院只有十幾位同事，大家熟絡，但記憶中我們交談不多。初次碰觸，是在慶祝書院十周年（1966）的研討會上。輪到我發言時，馬臨作為主持人笑咪咪走過來說，時間還有呢，你多講些不妨。同系馮潤棠兄不解，事後發牢騷說：「怎麼你就能講那麼久？」我也不明白，無言以對。

六年後我們搬進馬料水中大校園，不同書院的理科學系各自整合，分別進駐新落成的科學館南、北兩棟大樓，一時就很少機會碰頭了。但不旋踵，大學發動體制改革，李卓敏校長設立工作小組研究方案。馬臨作為理學院院長，我作為年輕教師代表，都先後捲進去，每周六相聚，整天開會。茲事體大，大家反覆論辯，弄得頭昏腦脹，馬臨卻默守一旁，很少發言。其實，他和余英時、邢慕寰是一起主持大局的。英時兄從哈佛回來出掌新亞書院又兼任大學副校長，順理成章是會議主席；邢公從中央研究院來，是李校長門生和研究院院長。他們盱衡全局，和李校長商討會議進展，都很自然。馬臨卻不一樣，他和李校長並無淵源，是在本港成長，從教師底層升上來的本地學者，所以能夠進入內圈，乃至後來被委以重任，完全是憑個人背景、學歷、氣質和修養——當然，因緣際會也同樣重要。

工作小組呈交報告之後，富爾頓（John Fulton）勳爵被邀負責改制事宜。他先去拜訪其時已經返回哈佛的余英時，然後來港與政府磋商，最後約見大學有關人士。想不到，我居然在邀談之列，而事後馬臨又緊張追問談話內容。大半年後，我休假到牛津大學進修去。一天馬臨來電話，說港府要李校長退休，全校騷動不安，着我找富爾頓想辦法。這自是義不容辭，我於是匆忙北上拜訪老人家，孰



馬臨(右)與筆者在他尊翁馬鑑教授畫像旁，2011。(圖片由陳方正提供)

料他表面客氣，其實老謀深算，將我的說辭批駁得體無完膚。我只有唯唯諾諾，繳羽而歸，向馬公稟告辱命經過，並將詳情函告小組中的老友金耀基兄。這時我對李校長倚賴馬臨之重還懵然不覺。

翌年返港，我驚覺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中大改制條例已正式通過，李校長退休，馬臨接替也成定局——後來耀基兄告訴我，「黃袍加身」完全出乎馬公意料之外，為此他惶恐不安多日，經邢公反覆分析勸說，才釋除疑慮，下決心擔起大旗。

當然，其時新亞書院反對改制最為劇烈，鬧得不可開交，大學起用年少老成，胸有韜略的耀基兄去收拾這個攤子，也為馬公解決老大難題，消弭了後顧之憂。翌年馬公上任，恰逢沙田馬場落成啟用，「馬年馬臨馬料水」遂成膾炙人口，難以為繼的半邊對聯。跟着大學秘書長辭職，馬公來勸說再三，我無法拒絕，又一次義不容辭，終於改行，搬到行政樓上班。此去為時不短，前後六年。

秘書處是全校行政樞紐，承上啟下，案牘勞形理所當然，其他大小事務則早有建制儀文，只需肅規曹隨，因革損益而已。要為馬公籌劃和分憂的，主要在於應付港府的壓力，和因應急速變化的政治環境。那是一段充滿挑戰的日子，由於耀基兄和我得到馬公充分信任，三人合作無間，所以緊張中其實也蠻充實愉快。

港府不斷施加壓力，是為迫使中大「四改三」，即是將本科學習年期從傳統的四年改為三年，以與英國體制接軌。這是個骨節眼，港府不依不饒，事在必行，中大則上下齊心，堅決反對。在這點上，港府其實是看錯了人，以為馬臨早年在香港就讀英皇書院，後來負笈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然後任教香港大學的經歷，必然會影響他的觀念，甚至誤以為他謙謙君子，木訥寡言的作風是出於軟弱。事實上，他出身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家庭，父兄都是中文系教授，抗戰時期就讀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所以國家民族觀念既深且強，我就多次聽到過他對港大當局歧視中國教師，特別是圖書館長陳君葆之受壓迫，表示憤慨。出任校長後，他雖然不常發表言論，維護中大學制的決心卻和李校長如出一轍，從來沒有動搖過。

我到秘書處之後，立刻就碰上「醫委會」事件。起因是中大新成立了醫學院，港府以英聯邦執業資格的要求為由，要改變醫科生的入學點和課程要求，從而顛覆大學學制。大學不察，沒有反對，於是學生將矛頭指向大學，一度包圍馬校長，氣氛非常緊張。我知道後勸他發表正式聲明，維持全校所有學生的通識和語文課程要求不變，從而平息了事件。港府於是改用迂迴策略，成立委員會檢討中學教育，企圖通過升學程序來影響大學收生制度。此會由教育司出任主席，大學司庫利國偉是重要成員。馬公派我代表大學去應付，經過一年唇槍舌劍，據理力爭，總算不辱使命，沒有讓政府計謀得逞。經此一役，利公對我增加了了解。他

是個銀行家，頭腦敏銳，麻利決斷，從不拖泥帶水。不久他出任大學校董會主席，經常直接找我談問題，省下馬公很多麻煩。

周旋兩個回合之後，港府決定用強，在1984年由掌握大學財政命脈的資助委員會UPGC正式來函，指責我們在醫學院收生問題上不合作，浪費公帑，要求解釋和糾正。馬公憂心忡忡，問我怎麼辦。我草擬了措辭強硬的回信，根據他們發布的指引，反過來指控他們越權，因為收生屬大學自主範圍。馬公雖然緊張，卻沒有退縮，帶我去會見一眾委員，當眾把信宣讀，然後交給主席。如此激烈反應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主席立刻打退堂鼓，把信收下，說會好好研究，跟着散會。政府只好把問題拋給利公，他照例問我，你們到底要怎樣？我也只有直話直說，告訴他我們在此問題上絕無商量餘地。此後數年間，問題就僵在那裏，馬臨始終沒有絲毫退讓，英國人也仍然在等待時機。

不過，對馬公來說，應付「四改三」只是工作一小部分。他花精力的，主要是人事問題，特別是把分散在各書院的個別學系加以集中，搬到一起工作。這得照顧許多特殊情況，平衡各方利益，所以必須逐步緩慢推進。在這方面我幫不上忙，倒是耀基兄能為他籌謀策劃，排除障礙。經過好幾年不懈努力，此事終於大功告成，至此新的大學中央集權體制才得以落實。除此之外，醫學院成立伊始，在眾多教授之間，學院和大學之間，都需要耐心和時間來磨合，這同樣消耗他大量精力。

校長住宅號「漢園」，位於大學對面小山坡上。宅內客廳與飯廳間的過道，放有一張小小鋪黑皮的紅木矮圓桌，李校長公餘之暇最愛在此獨酌沉思，品嚐威士忌。馬公同樣能飲，也有此習慣。那天怡芳說到「老戰友」，也提起這張矮圓桌，指的就是馬公經常找上耀基兄和我三人在此商討問題，議論局勢，度過許多難忘時光。馬公自稱沒有甚麼長處，很少出錯的緣故是每遇重大問題，必然反覆思考，仔細揣摩各方心理，然後作決定。其實，他為人忠厚，不忘故舊，所以能得人心。他見到港大幾位高班同學總不會怠慢，稱老上司、聯合書院院長鄭棟才為「鄭老校」，劉殿爵教授（那是他從倫敦禮聘回來的）為「學長」，對中學校長羅怡基（B. M. Kotewall）也同樣畢恭畢敬。想來，這當是受他尊翁馬鑑教授家風薰陶所致吧。他曾經提到，自己性格拘謹，處事小心翼翼，和父親治家嚴謹頗有關係。

80年代是個劇變的大時代，中大很早就感受到這股新風了。回想起來，1979年國慶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災難是第一個訊號。經常訪問大陸的楊振寧，在1981年來信提議訪問中大物理系，又是個訊號。此後他每年回國都必然以中大為落腳點，我於是提議邀請他出任訪問教授，馬公肯首，他也欣然同意，自此和中大建立密切關係，對中大聲譽產生很大影響。但最強烈的訊號，自然是1982年馬公突然受邀赴北京見鄧小平。他照例問我意見，我靈機一動，說大概是有關收回香港之事，不過只是通報，而非諮詢。這都猜對了，但我們都是象牙塔內人，都沒有悟到，這驚人消息有何等迫切現實意義，令利公頓足不已。後來中英談判結束，香港回歸成為定局，馬公興高采烈，認為「四改三」不再是問題。殊不知港府鏗而不捨，他退休之後仍然把中大學制改掉，香港回歸之後十幾年這問題才徹底解決。

中英談判展開之後，大陸訪客絡繹於途，熱鬧非凡，國內大學也紛紛邀請我們出訪。馬公出身浙江鄞縣學者世家，30年代父輩有多人在北京發展，赫赫有名，因此對這些往來酬酢總是談笑風生，揮灑自如，正所謂無入而不自得。當時國內大學亟待發展工商管理和社會科學，這兩個領域是中大強項，閔建蜀和李沛良兩位同事對此十分熱心，到處舉辦培訓計劃，不久就門生遍布神州了。在這場文化氣息轉變的浪潮中，我也有小小貢獻，那就是在1984年說服馬公，把榮譽文學博士頒發給巴金。其初他不了解巴老在文革後的轉變，有點猶豫，待看到剛出版的《隨想錄》和《創作回憶錄》之後方才被打動。在當時，頒發榮譽學位給大陸作家是創舉，更何況，巴老的小說家喻戶曉，所以他之來港，成為哄動一時的大新聞。那幾天，校園內洋溢着一片歡笑熱鬧，大家都感到，一個新的時代正在來臨。

但熱鬧過後不久，我就感到，自己在秘書處的日子應該結束了，因為我的志趣仍然是在學術領域，教育行政或者實際政治對我都沒有吸引力。為難的是，此意向馬公說明之後他很不高興，甚至變得消沉沮喪。這令我感到非常內疚，猶如臨陣脫逃，於是勉為其難，再留一年，緩解了他在中英談判關鍵時刻掛冠求去的危機。這樣，我在1986年盛夏終於告別秘書處，轉到近在咫尺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去，開始新的工作和事業。

那年深秋馬公和我作了一趟難忘的懷舊之旅。我們在倫敦會合，一道驅車北上，首先重訪他母校利茲大學，和北邊不遠的小鎮哈羅蓋特(Harrogate)，讓他緬懷昔日遊蹤；跟着去十年前我到過的約克郡桑頓谷(Thorton-le-Dale)富爾頓舊宅，探望他的遺孀——此番重來，斗轉星移，物是人非，老人家已經身故半年了；最後我們南返，到老人家手創的賽塞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參加他的追思會。回到香港之後，緊跟着就是圍棋傳奇人物吳清源的榮譽文學博士頒授典禮，那也是由我向馬公推薦的，也同樣引起了相當的轟動。它當是馬公和我的最後一次合作了。

過一年，馬公退休，但並沒有放下工作。他上任伊始，主要工作是落實大學新體制，和把新成立的醫學院辦起來；到行將離任，則把全副精力放到逸夫書院上面去。馬公是位篤實君子，邵爵士捐出巨款建立此書院，他便義無反顧擔任書院董事會主席，推動其發展不遺餘力。邵爵士為神州大地眾多大學捐贈館舍，馬公也風塵僕僕，為之籌劃奔波多年。在這兩方面我深知他有所期待，惜乎人生有限，實屬無可奈何。

馬公愛游泳，也喜歡開車，退休後仍然自駕返回逸夫書院視事，順便到近在咫尺的沙田馬會游泳，多年來風雨不改。我退休後彼此年紀都大了，來往日稀，只偶爾相約飲茶，和新歲到他家拜賀而已。三年前驚聞他陡然昏迷住院，趕往探望，則已經表情呆板，語句凝滯，顯然是大腦受損，據說是患腦膜炎所致，但醫治多月，亦未見進步，倒是歸家後，得夫人陳萌華醫生和在港女兒怡芳、元芳悉心呵護調理，漸有起色。今年新春和楊振寧一道去探望時，覺得他雖口不能言，神氣卻比前清朗生動。月前在北京，忽地噩耗傳來，一時茫然，回港出席他的喪禮和追思禮拜，更是心緒澎湃，五十年舊事一齊湧到心頭。俱往矣，馬公這輩子跑過好長的路，打過許多美好的仗，好好安息吧！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